“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李　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日本作为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中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但这并非如一般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日本文学的“经验”赋予了中国文学以新的因素。我们更应当考察中国作家在日本的深刻的人生体验，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日本体验”的角度挖掘生存实感的变迁之于文学变迁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是中国作家在日本的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使他们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这便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关键词　体验　日本中介　中国现代文学　发生

作者李怡，1966年生，文学博士，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重庆　400715）。

一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千年衰微的变局中发生的。在这一“发生”过程中，曾经留学异域的中国作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这一显著的作用被我们的文学史普遍描绘为“引发”。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过程之中，外来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的“引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外来观念对近现代中国留学生并通过留学生对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型”提供了诸多启发。

但是，究竟如何描述和估量留外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所承受外来观念的方式，或者说所谓的外来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他们并通过他们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产生意义的？今天，卓有成就并渐趋成熟的一种阐释模式是“中外文化交流”。即考察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接受了哪些外来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寻找与那些外来文化相类似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这一阐释模式是随着新时期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大势而出现和强化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是在开放与交流的大势中恢复了生机。重新肯定和挖掘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姿态与交流内涵，借助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这就逐渐发展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曾小逸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走向世界文学》一书便是这一学术研究的主流话语形成的标志，这一著作不仅集中展示了当时新近涌现、后来成为本学科主力的大多数学者，更重要的是它所提炼的“走向世界”的中心命题几乎就是一个时期的价值取向，著作副题“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所昭示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则成为新时期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最富时代特色的方法，而以“世界文学”为恢弘远景的认知更促使了人们对于“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这“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学观念”的质疑。①

应当说，这一研究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它的确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所背靠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但时至今日，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实际的文学比较中，我们又很容易忽略“交流”现象本身的诸多细节，或者说是将“影响研究”简化为异域因素的“输入”与“移植”过程。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文学创作这一精神现象的复杂性。因为精神产品的创造归根到底并不是观念的“移植”，而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体验与表达，作为文化交流而输入的外来因素固然可以给我们某种启发，但却不能代替自我精神的内部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现象最终能在我们的文学史之流中发生和发展，一定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我们自己的“结构”，并受命于我们自己的滋生机制，换言之，它已经就是我们从主体意识出发对自我传统的某种创造性调整。王富仁曾指出：“文化经过中国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头脑之后不是像经过传送带传送过来的一堆煤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也不是装配工，只是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装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机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创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人的创造物，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的性质和作用不能仅仅从它的来源上予以确定，因而只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中无法对它自身的独立性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②到今天为止，我们读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依然常常是，将“文化交流”中的外来观念的输入当作中国文学发展的事实本身。这就难怪在近年来的“现代性质疑”思潮中，不少学者都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动向指责为“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因为，至少是我们的文学史本身并没有描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进行独立精神创造的生动过程。

那么，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创造的重要性，又该如何来估价它与实际存在并且也同样至关重要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关系呢？我以为，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的是另一基本精神现象——体验。

与影响研究中经常涉及的“知识”、“观念”、“概念”这一类东西不同，“体验”更直接地联系着我们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包括美学趣味、文学选择在内的人类文化现象的转变，归根结底可以说就是体验——包括体验内涵与体验方式——的转变，这正是西方 20 世纪思想家与美学家的一个重要发现。现代阐释学的创立人伽达默尔曾经为我们考察过“体验”的认识史，他想通过考察提醒我们注意体验之于生命存在的本体性意义，“它不是概念性地被规定的。在体验中所表现出的东西就是生命。”“每一种体验都是从生命的延续中产生的，而且同时是与其自身生命的整体相联的。”③ 另一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也特别论述过“心态气质（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历史转型更为根本”。④ 当然，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转型与舍勒所论及的具体情形并不相同，我们不必受制于这位德国学者所概括的“心态气质（体验结构）”样式，但他们对于“体验”之于主体的自我演变、又经过自我的演变决定更大范围的文化演化的认识无疑是极具启发意义的。对于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人而言，“体验”都同样是我们感受、认识世界，形成自己独立人生感受的方式，也是接受和拒绝外部世界信息的方式，更是我们进行自我观照、自我选择、自我表现的精神基础。换句话说，所谓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文化观念的传递，而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的自

① 参见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学·导论》，《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年）第 36 页。

② 王富仁：《对一种研究模式的置疑》，《佛山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

③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94、99 页。

④ 刘小枫：《舍勒选集·编者导言》，《舍勒选集》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第 10 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我体验问题——既有人生的感受又有文化的感受。在主体体验的世界里，所有外来的文化观念最终都不可能是其固有形态的原样复制，而是必然经过主体筛选、过滤甚至改装的“理解中”的质素。中国作家最后也是在充分调动了包括这一文化交流历程中的种种体验的基础上实现了精神的新创造。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与人们（无论是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的现实生存体验密切相关的。这是比任何思想活动远为根本而重要的层次。现代性，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存体验问题。”① 所谓中国现代作家对异域的体验，这样的精神现象就既有文化交流的烙印，同时也更属于主体的与自我的内在精神活动。

在中国近现代留学生所完成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其实更应该成为我们讨论对象的就是留学生作家的“日本体验”、“英美体验”、“法国体验”、“德国体验”、“苏俄体验”等等。

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日本作为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中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在传统中国文学的创作资源消耗殆尽、创造能力日渐枯竭时，是中国作家在日本对于西方文化的“体验”首先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令他们在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这便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在中国文学的近现代演变中，最早出现的留学生作家群体是在日本，留学作家人数最多的也是日本。郭沫若后来自豪而不无夸张地宣布：“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②

文学的魅力来自于新异的人生感受与语言感受，换句话说，文学创作持续不绝的“新意”就在于作家能够不断掘取异样的人生意味，不断提炼新鲜的语言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并不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断裂’了中国文学的传统，而是传统的中国文学自身已丧失了应有的“新鲜”魅力，中国的现代新文学也不是在“五四”前后的运动中才被鼓噪发动起来的，它的“发生”应当追溯到中国作家走出古典模式、发觉“异样”趣味的时候，而这就不得不提前到近代中国学人留学海外的年代，就不得不回溯到首先拥有众多中国留学生的日本。

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自闭性与超稳定文化发展的滞迟性都给近代中国作家提取文学“新意”造成了很大困难。可以说，千年不变的社会形态加快了中国人消耗自我生存体验的速度，在司空见惯的风花雪月中，中国作家的艺术灵感几近枯竭。在辉煌不再的日子里，艺术感受的阻塞给了每个后来者极大的精神压力，“吾辈生于古人后，事事皆落古人之窠臼。”③ 近代中晚唐诗派诗人易顺鼎的感慨在当时颇具典型意义。像易顺鼎这样的诗人之所以会有如此深切的痛苦，恐怕就是已在内心深处隐约悟出，无论是“宗唐”还是“宗宋”，都无法寻觅出更多的创造激情了。正是这一份愈来愈沉重的压力让大多数中国作家丧失了创造能力，也难以捕捉创造的机会。中国的现代新文学需要能冲破压力的新一代作家，也需要能提供新的人生艺术感受的新场景、新空间。既然传统文学的教育再也无法培育冲破压力的新人，而陈旧不堪的山水也不足以激发人们的灵感，那么，中国文学新生的契机也就自然转向了域外。

跨出了因熟悉而漠然的农业世界，惊奇于近代化历程中的日本及其被日本介绍的西方文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开始孕育着新一代的中国作家，决定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最大的一批作家群

①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 页。

② 郭沫若：《桌子的跳舞》，《郭沫若全集》第 1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第 53 页。

③ 易顺鼎：《癸丑三月三日修撰万生园赋呈任公》，《庸言》1 卷 10 号。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体由此形成了。在当时，近代化的日本所蕴藏的就是中国人所渴慕的“先进”的秘密，所代表的就是令我们亦惧亦羡的西方文明。正是这种对于异域“先进”文明的急切的渴求让最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我们的近邻——日本。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留学生是 1846 年冬美国传教士布朗从澳门回国时带走的三名孩童——容闳、黄胜与黄宽，第一次官方意义的留学运动则开始于 1872 年夏天，包括詹天佑在内的 30 名幼童被清政府送往美国留学，接着，又有 1877 年开始的公费留欧，但是，中国人大规模赴外留学还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而首选的目标就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在一种“耻不如日本”的民族忧患中，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大派游学，以通世界之识，养有用之才。”① 张之洞发表了著名的有“留学日本宣言书”之称的《劝学篇》②，对日本作出了极具鼓动性的判断。自此，中国留日学生渐成规模，人数逐年递增，进入 20 世纪初叶以后最高竟达万人（1905—1907 年间），从 1901 年到 1911 年，每年留日学生的人数都高于留学其他各国人数的总和。留学日本成为当时中国有志留洋者的首选。以后，随着美国等退还庚子赔款用于留学资助，特别是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出现，留日活动长期雄居留学主潮的格局才得以改变。

当然，近代以后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并非都是未来的新文学作家，但未来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时，其基本思想高度与崭新文学个性的决定性力量却来自这些留日的中国作家。前者是以鲁迅兄弟的思想探求为代表，而后者则体现为创造社作家的文学实绩。鲁迅兄弟留日时期以“立人”为基础建立的知识结构、文化视野的过程，生动展示了新的文化如何撕裂陈旧传统，如何在固有文学囹圄中破围而出、开拓现代文学新理念的全过程；创造社一代则寻找到了一种更自由更张扬的生存方式，这也是“现代”的中国文学的坚实的人生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更加无所顾忌地拉开了与传统文学的距离。

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换中，处处留下了留日中国作家的“体验”痕迹。最后，是无数这样的主体体验的汇聚，才形成了对新文学“发生”的强有力的支持。对于置身日本生存包裹中的中国作家而言，“体验”就是感同身受，而不是“五四”时代大规模的文字层面的“中外文学交流”，这完全可以从近现代文学的演变历史中看到。中国近现代作家因为日本而改变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这在一开始就主要不是“中日文学交流”的结果，而是这些中国作家自身生存实感的重要变化所致。以中国诗歌近代嬗变的第一人黄遵宪为例，在出使日本的过程中，黄遵宪主要不是一位向日本文学虚心求教的“学生”，相反倒是不断登门拜望的日本知识分子给了他国学大师般的自我满足。黄遵宪新派诗的“新”来自于“中华以外天”的异域风情，来自于他对日本新奇的直感。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本质性变动的农业社会里，当诗材因大规模的创作而不断耗尽，正是黄遵宪在日本的新鲜见闻——医院、博物馆、学校、报纸、博览会、警察乃至假名文字等等诗歌的“新题”开拓了中国诗歌的新的可能。同为近代诗歌的“新”，黄遵宪鲜活的“新题”显然要比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在国内搜肠刮肚的名词之“新”要成功，在文学史上留下的意义也更大，到后来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主张时，便是反思了当年自己仅仅着眼于新名词的弊端，他更加重视的是黄遵宪式的以异域新体验为基础的“新派诗”：“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③ 在梁启超这

①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01 页。

② 语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 年）第 23 页。

③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 2 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1219 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里，出国以前他主要是从“知识”上接受日本文化与其他西方文化，但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却使他从对异域文化的“旁观”转为在日本文化“中”的实际生存。只有在这个时候，当先前的理性观照与如今感同身受的亲身体验相结合时，才真正出现了“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兴奋，也才有了后来影响中国近代文学嬗变的文学诸界“革命”的具体主张：“盖吾之于日本，真所谓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之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① 到了鲁迅、周作人以及更年轻的创造社同人一代留学生，则是立足日本，转而对整个西方文学的发现和接受了，其中像鲁迅这样的作家已不再将主要的目光专注于日本文坛，以至在周作人看来，他“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② 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作家文学视野的扩大，日本作为世界文学“集散地”的意义明显大于它作为直接的文学“输出”国的意义。

我们将留日中国学人之于日本的关系重新定位在“体验”而不仅仅是文字阅读所承载的“文学交流”，这当然不是就此否定了文学交流的存在，而是强调将所有的书面文字的认知活动都纳入人们生存发展的“整体”中来，将所有理性的接受都还原为感性的融合形式，是以感性生命的“生存”为基础的自我意识的变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而言，中国作家“体验”日本的生存方式与价值至少有三个层面的表现。

首先是通过在日本的异域感受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郁达夫说过：“人生的变化，往往是从不可测的地方展开来的。”③ 当留日中国学人脱离了中国固有的家庭、社会与国家的组织结构，在一处陌生又充满新奇的土地上开始生活，他们因异域社会中耳闻目睹的新异而造成人生的世界的观念上的冲击，这样的“体验”可以说极易发生。外族异样甚至是侮蔑的目光击碎了中国人自我中心的优越感，改变了他们对于自我与世界的固有定位，郁达夫便将日本人的有意无意的轻视称为“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他深切的体会是：“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小圈子里争权夺利的黄帝之子孙，若要教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那一国去住上两三年。”“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④ 再如，我们以两性关系为例，日本崇尚自然的古老民俗与开放西化的近代趋向都导致了它这方面的社会观念有着某种的宽松与自由，这一点，不仅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统治下的中国人所惊讶，甚至连美国学者也颇多感慨：“日本人并不认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罪恶。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享受是正当的，而且值得提倡。”“对于性享受，我们有许多禁忌，日本人可没有。在这个领域里日本人没有什么道德说教，而我们则装得道貌岸然。”⑤ 正处于青春期的许多留日中国学子，当然难以避免这一生存事实的冲击和影响。周作人刚到东京就惊羡于日本少女的“天足”⑥，郁达夫“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便陷入了“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他感到所有民族的屈辱都集中在了两性关系的痛苦。⑦ 留日学生向恺然的小说《留东外史》极力渲染留日学生寻花问柳的放浪生活，虽不能说就是留日中国学人的生活实际，但却很可能

①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1217页。

②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③ 郁达夫：《大风圈外——自传之七》，《郁达夫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第433页。

④ 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第93页。

⑤ 本尼迪可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155页。

⑥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

⑦ 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4卷，第93、94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是他们各自“想象”的事实，心理的想象，这也是异域体验的重要内容。提到《留东外史》，但凡有过留日经历的中国作家都表达了较多的理解。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在留日 55 年后，作家贾植芳满怀兴致地重温向恺然对留日学生的分类，他颇能理解其中那些文学青年的心理与处境：“在国内时多半出身旧式家庭，精神受着传统礼教的压抑，个性处于委顿状态；他们一到日本，除了每月的开销多少要家里补贴一些外，其他方面都摆脱了日常的束缚，不再需要低眉顺眼，装出一副老实样子去讨长辈的喜欢，也不需要整天跟自己并不相爱的旧式妻子厮守在一起，甚至也没有中国社会环境对年轻人的种种有形无形的压迫。他们在新的生活环境里自由地接受着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新思想，慢慢地个性从沉睡中醒来，有了追求自身幸福的欲望。对年轻人来说，最现实的幸福莫过于恋爱自由，这在国内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① 两性关系仅仅是一个窗口，通过它，留日中国学人因社会生活的改变而获得的“异域体验”可见一斑。

其次是在日本的生存交往中形成了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链条，这种“小群体”的交流更真切地影响了中国作家的思想与思维。美国著名的小群体社会学家西奥多·M·米尔斯分析说：“在人的一生中，个人靠与他人的关系而得以维持，思想因之而稳定，目标方向由此而确定。”② 从本质上讲，中国留日知识分子（作家）的真实“体验”常常不发生于抽象的族群整体而在具体而微的“小群体”中，常常不发生于外部世界的单向作用而在自我从个人经验出发与周遭环境的对话。在留日中国作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充满意义的个体与“小群体”。如政治流亡家章士钊、陈独秀等在日本编辑《甲寅》月刊，这些编辑与作者群体彼此因为对民国政治的失望而聚合在一起，他们的文字之交又在不断的相互对话中加强了思想认同。后来陈独秀离开《甲寅》回国，另办《青年杂志》（《新青年》），便充分发挥了这些有着类似的日本体验的作者群体的作用。再如以鲁迅为核心组成的留日学生圈：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所参与的浙江留学生关系圈，又有鲁迅在民报社听讲于章太炎而与钱玄同等八人结成的“师兄弟”关系。他们彼此的交往、交流决定了对一些人生社会问题的理解方向（例如鲁迅、许寿裳讨论理想的人性），彼此也构成某种行为上的牵动与鼓励，这不仅影响了当时的鲁迅，也影响了回国后鲁迅漫长的文学和人生实践。许寿裳编辑《浙江潮》向鲁迅约稿，鲁迅隔天就送来了《斯巴达之魂》，钱玄同后来的“著名”约稿则催生了《狂人日记》。此外再如 1907、1908 年间，鲁迅、周作人与许寿裳相互配合，连续在《河南》、《天义报》等处发表了一批论文，探讨文的革新与人的精神进步问题，鲁迅有著名的《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周作人有《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哀弦篇》等，许寿裳则有《兴国精神之史曜》，章太炎的宗教思想与复古思想对于留日时期的鲁迅、周作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留学也让创造社作家群走到了一起，“以郭沫若为中心，创造社初期的几个朋友都发生连系了。”③ 冯乃超则是后期创造社的人际中枢。几年后，在郑伯奇、成仿吾等人的邀请下，这批青年都汇入了创造社的阵营，并实现了创造社的“方向转变”。

再次，日本的生存体验归根结底还是由作为“个体”的中国作家来发掘的，而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个体都不是被动的，个人的人生经验会参与到群体的认识之中，并且与群体构成某种对话的互动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适应自己族群的同时，人也同样在反抗着自己的族群，而适应与反抗的选择又往往与他先前的人生经验相关。康有为对于梁启超的牵制，梁启超同时与

① 贾植芳：《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91 年第 1 期。

② 西奥多·M·米尔斯：《小群体社会学》，温凤龙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 页。

③ 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创造社资料》下册，姚鸿竞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752 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其他类型的留学生交往，终于成为一个既区别于康有为又区别于青年留日学生的“过渡性”人物，鲁迅“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经历显然与梁启超等人高层政治失败的感受不同，所以在日本，鲁迅一面接受民族革命风潮的影响，另一面也比别人更冷静，对当时的革命不无自己内心的疑虑，对周遭的人与事不无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他更关注的是个人的人生际遇与人性完善，——正因为有了个人遭遇的汇入，各个留学生的思想也才会出现转化与分化，而这样的转化又与特定时代变化的因素相结合，从而形成留学生思想不同的代际特点及其各种“潮”与“流”。

三

考察中国作家的日本体验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我们发现其中始终包含着一组基本的关系项：异域/本土。

来自日本的体验对中国文学有怎样的“影响”机制？换句话说，它究竟怎样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中发挥作用？我以为，这里必须摆脱传统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某些思维，即不能仅仅将“影响”解读为其他异质文化在中国的“输入”，需要充分重视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体验活动的主体——中国留日作家的主体心理及其文化需要。“体验”的核心总是人，是作为体验者的主体精神活动。与体验对象比较，体验者的心理过程与认知结果无疑更为重要。一切外来“影响”最终还要通过个体基于人生体验的认知与选择来体现，不能将个体生命的成长径直视为对其他文化（师长、前人、传统或异域）的“收集”过程和“承受”过程，并根据这一情况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80年代人们就常因中国作家汲取了西方文化，而将之激赏为“开放”，90年代又因同样的事实指摘其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权”，其实，我们既不能漠视外来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发生发展中实际存在的触发作用，也没有理由径直认定一个作家自身的某种特点“就是”他向西方“开放”的结果。中国留日学生获取“日本体验”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些所获是否真的属于日本，而在于它们究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世界提供了哪些新的感兴，最后又怎样推动中国文学在固有基础上的新创造。郭沫若说过：“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① “东洋气”就是体验，它根本上决定了郭沫若读“西洋书”的方式。

既然我们强调的是体验者的主观精神世界，那么就必须看到这一世界并不是“到了”日本后才形成，其实经由一个不断成长的生命过程，先前的人生与文化经验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继续参与了新“体验”的发生：作为一种人生或文化体验，我以为“日本体验”的深层意义还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留日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从自己固有经验出发获得的新的人生经历与感受。“新”是这一体验之所以构成体验的原因，而作为感受的“新”，“日本”的本质意义也主要不在日本文化本身，而在中国留日者的经验对比之中。在这里，“日本”意义的凸现必须以“中国本土”为前提，“日本的新体验”必须以“中国的旧经验”为衬托，“日本体验”这一看似空间关系的发现中又包含了中国人自己的对于历史的时间性感受，从而在总体上成为中国文学在从古代到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整体时空感受成分的重要组成，“日本体验”的背景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生长过程，裹挟着它的历史潮流绝不是单纯的中外交流，而是中国文学自我发展的内在诉求。也可以这样说，中国留日学生“日本体验”的内核是深刻的“中国体验”。

这里便包含了我所谓的一组基本的关系项：异域/本土。就是说，并不是异域的日本文学自

① 郭沫若：《三叶集·郭沫若致宗白华》，《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40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身对中国文学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而是中国人“在日本”的体验与自己的本土需要这两者间的“关系”，赋予了中国文学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概括起来，我们大体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组关系项的实际效能：

1. 中国文学现代转化的“动机”是本土的需要。如前所论，在大规模的中外文学交流之前，中国文学已置身衰弱不振的境地。当近代中国文学家沿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故辙继续前行时，他们大多体味到了灵感淤塞的尴尬。在这个前提下，如何激活文学的灵性，重现创造的灵光，便成了内在的迫切要求。

2. 日本异域体验的根本意义在于“激活”。这些新异的社会人生见闻击碎了业已封闭的文学思维，在我们原有的令人窒闷的写作惯性之外另开一重天地。在这里，“本土”的第一层意义就是自我，就是自我的精神世界，“本土需要”也就意味着借助“异域体验”来恢复自我的感知能力。这就是郁达夫所说的“觉悟”：“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对郁达夫这样的青年学生而言，日本体验的强烈冲击有时候简直难以招架：“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坦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① 但另一方面，自我精神的生长却往往就在这“如潮水似”的异域体验中，鲁迅说得好：“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②

3. 日本异域体验的最终成效又还得中国本土来加以“验证”。这里的“本土”又意味着文学体验的对象，“本土需要”就是“体验中国人生”的需要。获得了“日本体验”的中国作家并不是以书写日本见闻为自己的天职，对于本土人生的重新发现才是他作为“中国”作家的目的，日本或其他任何一种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本身并不是衡量中国文学现代成就的标准，中国作家在本土所表现出来的创造能力才是文学的财富。也就是说，通过异域又返回本土，并使自己的灵感为之“复活”，这恐怕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一方面，鲁迅可能是最自觉的一位。鲁迅早年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就总是将异域的见识“拉回”到“中国”的现实，体验“日本”与体验、反思“中国”几乎是同步的，日本的国民性问题启迪的是鲁迅的中国的国民性问题。鲁迅后来甚至很少整篇“畅谈”日本事物，但这并不表示他缺乏对日本的体验，恰恰相反，他是将在日本体验中获得的人生感悟投放回中国，或者由眼前日本的现象不断联想到中国，或是在体验中国事物的过程中不时插入日本，以便比较。1918 年，在介绍日本作家武者小路的人道主义思想时，鲁迅道出的却是对中国人的忧虑：“全剧的宗旨，自序已经表明，是在反对战争，不必译者再说了。但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③“我想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意志一半强，不知国民性是怎么一种颜色。”④ 1934 年，因为给海婴照相的经历，他又联想起了中日两国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差别，“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

① 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 4 卷，第 93、94 页。

② 鲁迅：《摩罗诗力学》，《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65 页。

③ 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鲁迅全集》第 10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95 页。

④ 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鲁迅全集》第 10 卷，第 192 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日本孩子。”“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① 在《鲁迅全集》中，到处“散落”着这样的日本体验，到处都是鲁迅从日本“返观”中国的精辟之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今天，我们常常引述鲁迅《文化偏至论》中的这段话来说明文化与文学的“比较意识”，或者证明中国人在开放中“走向世界”的必要性，但文化“比较”与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却可能被忽略：作为一位中国作家，最重要的应是感悟自己的人生而非在“比较文学”的时代“变”得与西方一样。或者说，首先必须“直面”和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这才叫“首在审己”。鲁迅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他的“审己”，在于他比照先前的日本体验，为我们重新描绘了中国人生的“惨淡”与“鲜血”，这些人生的“惨淡”与“鲜血”又正是那些囿于传统视野的作家未曾发现的。

这就是中国作家从本土需要出发，经由异域体验的激发，又返回到本土体验的全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上日本体验的特殊作用之所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上，异域/本土的互动关系贯穿始终。但应当看到，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文体，这一组关系具体呈现的层次都不相同。如果我们将从黄遵宪到梁启超的文学诸界“革命”视为发生史的第一阶段，那么这一阶段的文学嬗变则联系着留日中国作家“初识”日本的结果，从日本的初步“实感”中摄取的“新题”进入了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多年后的中国诗歌终于有了自己的“新派”，这“新派”便成了梁启超“诗界革命”的基本依据；为日本戏剧资源所包裹的中国戏剧家也获得了类似的异域生存体验；散文的现代嬗变最是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作家在自己生存体验的支持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文体的全过程——这里有源自本土的需要，有从本土需要出发吸纳异域资源，也有异域体验反过来对自我认识的推动与深化；相对而言，倒是小说家仅仅从文学“观念”上取法日本而忽略了生存的丰富，所以“小说界革命”的实际成果常常流于枯燥无味。以后，留日中国作家在这些“初识”日本的基础上继续提炼，他们开始超越了“初识”的粗疏与笼统，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宏大目标下潜到个人的人生遭遇的深刻发掘。在鲁迅、周作人兄弟那里，日本的体验与个人内在的自我意识相互融会，无论对于日本还是本土或者文学艺术本身，这都可称为前所未有的“深度体验”。到了“五四”，更多的新文学倡导者拥有了区别于晚清一代的“深度体验”，他们自觉地将异域的感受与自我发展的深切愿望相互沟通，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展开则是一系列中国作家“深度体验”的共同要求，至此，中国文学的现代嬗变得以完成。到创造社作家那里，对日本体验的发掘似乎又演变成他们抗拒既成文学权威的一种“需要”，于是，流行、活跃于当时日本的西方“先进”思潮成了他们竭力标举的旗帜。到此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格局应运而生。

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来看，“异域—本土”这一组互动关系中的每一项并非总是起着相同的作用，在不同时期调动“异域体验”或“本土需要”的方式也有差异。大体说来，从晚清中国文学的衰弱不振到五四新文学的诞生，这一阶段主要是如何借助“日本体验”激活我们“本土”灵性的问题，因此异域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可谓是文学发展的“前提”，而中国本土的需要则是它的潜在指向；当五四新文学出现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关键则成为如何在“本土”体验人生，在“表现中国”中发挥创造活力的问题，也就是说立足本土又当是文学发展的“前提”，而包括日本体验在内的异域体验则是它的潜在资源。只是，并非所有的中国作家都能恰到好处地认知和调动这些“关系”，于是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就存在着诸多的变数。

① 鲁迅：《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81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四

当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并不能仅仅归功于中国作家的“日本体验”。如果我们将肇始于《新青年》而成型于上世纪 20 年代初年的现代白话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最终标志，那么，在这一历史性时段，除了留日中国作家无可比拟的群体优势外，从其他欧美国家归来的留学生作家也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仅以推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杂志为例，第一卷主要作者皆为留日学生，第二卷新加入的重要作者中出现了留美的胡适，留日又留英的杨昌济、吴稚晖，留日又留德的马君武，其他新加盟者除刘半农外也都有过留日经历，编辑出版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的第三卷至第七卷，新加盟者既有留日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欧阳予倩、朱希祖、陈启修、杜国庠等，也有留德的蔡元培、留美的任鸿隽、留日又留美的陈衡哲以及留日又留英的章士钊等。这一人员构成已经告诉我们，其他欧美留学生作家特别是英美留学生作家也直接介入了中国文学的现代革命。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受哺于中外文学交流的丰富成果，受哺于中国作家的一系列异域体验如“日本体验”、“英美体验”、“法国体验”、“德国体验”、“苏俄体验”等等。在所有的这些“体验”中，我以为“日本体验”与“英美体验”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起着某种结构性作用。简言之，五四新文学运动就是“日本体验”与“英美体验”在中国作家精神世界中构建起了一种新的“主体结构”的产物。日本体验为中国作家造成的生存压力激发了他们生命的内在活力，日本体验中所感知的西方现代文明景象则成了他们的理想目标；而英美体验又给中国留学生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训练，英美文学发展中的具体文学策略也往往成为中国作家直接取法的对象。显然，前者更带有现实人生的内涵，而后者常常联系着更具体的文学“艺术的”与“技术的”操作思路。

中国作家在日本生存的艰难不断提醒他们“为人生”的意义，不断昭示出民族的危机与文化的“整体”性难题，文学作为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被纳入“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建设的恢弘图景，这在中国文学的传统模式中从未有过的。不过，在 20 世纪初叶，紧张的充满民族压力与实际生活压力的日本生存，尚未能促使中国作家专注于某一文学“思潮”的领悟和体验，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急于推进社会政治启蒙的留日中国作家，曾经对文学事业怀有更多的功利性设计，这在某种程度影响了他们对文学深层魅力的发掘，实际上也限制了文学真实的社会影响的播撒。例如关于中国近代语文的“白话”运动问题就是这样。众所周知，早在黄遵宪出使日本时就已注意到当时日本正在推行的言文一致运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黄遵宪结合他的日本体验，详细分析了中国所存在的言文不合的实际，提出了汉字从简、言文复合的见解。正是这一理性的认识对梁启超及戊戌维新中的白话文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1896 年，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里探讨了中国文字脱离语言变化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其中，黄遵宪一年前出版的《日本国志》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黄著与梁文都在戊戌维新时期风行一时，并催生了裘庭梁的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根本》，在维新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中，此文可谓纲领性文件，文中“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可谓振聋发聩。接着，便是全国范围内的白话报刊竞相面世，持续不衰，据蔡乐苏统计，从 1897 年到 1918 年，创刊的白话报刊竟多达 170 种①，留日学

① 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部白话报刊》，《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5 集，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界也办起了《新白话报》、《白话》等刊物。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如此规模浩大的近代白话文运动却并没有如后来“五四”的《新青年》那样，真正揭开中国文学现代白话发展的历史。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五四”以前的这些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终归还对包括白话文在内的一切文学文化事物怀有过分强烈的功利主义目的：一律作为他们启迪民众政治觉悟的工具。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白话与白话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没有打算真正赋予白话之于中国文学的“本体”性地位。裘庭梁看中的是“日本用白话之效”，所以白话便成了“维新之本”（而非“文学之本”），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的发刊词中提出，用“顶浅俗的话”就是为了引导群众“通达学问，明白时事”，林獬（白话道人）的《中国白话报》的发刊词中说得更明白：为了让识字有限的老百姓起来关心我们国家的大事，“我为着这事，足足和朋友们商量了十几天，大家都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罢。”① 这是在说，“我们”依然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上等人”，为了国家的强盛，“我们”姑且向没有知识的“下等人”推广“白话文”。白话文与白话报固然可以这样兴盛起来，但是，在这些自认为“上等”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白话其实首先还是为了“用”而不是“体”，所以除了启迪群众之“用”，他们自己的自抒胸臆乃至酬唱应和之作，却依然还是“雅驯”的文言文，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将“文学’置放在了一处超越“俗白”的高雅之所在，是需要用他们久经历练文言文加以呵护与润泽的。这说明，此时此刻大多数中国作家都尚未做好以白话思维完全代替文言思维，进而建设全新的中国文学的准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胡适为代表的英美知识分子的加入给留日中国学人的文化与文学革命事业以莫大的支持，在通过白话文意义的确立而最终完成的中国文学现代转换之历程中，“英美体验”与先前的“日本体验”的确形成了有益的支撑性结构关系。关于“英美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详细考察，当属于另文讨论，但在此至少可在一种对比性的向度上指出，从官费幼童到庚款留学，从容闳笔下的巴脱拉脱夫妇到胡适日记中的 Patterson 夫妇，② 抵达英美的中国学子似乎较留日学人拥有更亲善、更宽松的生活环境，这种生活上和人际关系上的亲和力牵引这些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与具体的文化思潮有更加切近的“投入”，同时，相对正规和严格的学科学术训练也规范了他们的思维，当胡适竭力以“认真、镇静、不动摇、不纷扰、安于学业”的心态进入“言文关系”的思考时，他依据的是世界民族语言的发展规律，他引证的也是中国悠久的语言史与文学史材料，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宏大的参照之下，他要解决的也的确是文学“自身”问题，并且这些言论也最早发表在体现着中国学者现代学术精神的《科学》杂志上。无论胡适的关于白话文的倡导、论证和实践在今天看来还存在多少粗疏之处，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正是胡适广阔的语言与文学的视野，才将白话——文言问题从工具辨析的层次进入到创作的“本体”。从此，对白话的讨论与思考都同时意味着对作家主体思维方式的检讨，对白话的讨论就是对“国语”的讨论，而对“国语”的讨论也同时意味着对“文学”的讨论，文学与国语、文学与白话就此建立了不容分离的联系，这样，当五四白话文革命成功，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学现代革命的成功。过去，我们曾将胡适的这一主张斥之为“形式主义”的偏颇，其实，相对近代中国工具理性思维的白话文运动而言，胡适的“国语文学”之论恰恰是一种“本体”论，其“形式”也是有“内容”的“形式”，有“精神”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

① 见《中国白话报》第 1 期（1903 年 12 月 19 日）。

② 见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 年）第 79 页，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 年）第 77 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当然，像胡适这样的“英美体验”与其他中国作家“日本体验”相互支持、协调作用的情形，大约也主要存在于“五四”中国文学革命之时，在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继续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却看到了这两种体验彼此分歧、各自敞现的事实。这是因为，英美与日本毕竟是社会文化差异明显的区域，它们给予中国作家主体精神的影响也自不相同。特别是“五四”以后，由于归来的中国留学生社会地位与文化取向上的明显差距，他们各自所倚重的异域资源也更加显露出了彼此的分歧。充满社会改造热情但学科教育不够完整的留日知识分子常常只能在社会的中下层艰难求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决定了他们的文学思想与文学追求带有更加明显的社会性、大众性与政治革命色彩，其中一些作家倾向于进一步切入本土的人生体验，视文学创作为现实人生的“苦闷的象征”，以异域弱小民族的反抗意志当作现实批判的动力，鲁迅、胡风就是这样；另外一些作家则试图在日本或经由日本继续获取对抗现实压力的“先进武器”，于是他们从日本找到了苏联，找到了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创造社作家就是这样。而英美留学生呢，因为一般都完成了令人羡慕的高等专门教育，在国内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便与社会的普通民众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同时倒是与国家的管理层达成了某种微妙的默契，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中原本存在的批判性资源被他们作了某些有意无意的淡化，而所谓理性、节制的新人文主义倾向与充满实用精神的经验主义倾向都得到了一定的强化，学衡派、新月派都是如此。当然，现代中国的留学生作家并不就来自于日本与英美两地，但是，从反映中国现代作家的异域教育状况与后来长期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相应的文学态度方面，留日派与英美派中国作家却无疑构成了相当典型的两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一个潜在的日本—英美的体验结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总体面貌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两种体验的异质对应及其复杂演变中，当能更加清晰地辨认和理解日本体验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意义。换句话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发生”和“成型”之后，“日本体验”的存在，以及这一体验与其他异域体验的复杂关系，依然是影响我们主体创造的重要因素，这便为我们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留下了许多值得深究的课题。

〔本文责任编辑：王兆胜〕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10) **Modification of Narrative Mod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Seen in the Two Func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 Wujin* °132°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syste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three theoretical premises, namely, the infiniteness of resource and production development, the single function of productive force that is always progressive and revolutionary, and the freedo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ideology.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ers have challenged these three premises and revealed another fun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ideology, invoking changes in the narrative mod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irst, ecological context joins as a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econdly, new lights have been cast on the nature and historical role of productive force. Thirdly, the proposition that "social being determines social consciousness" is re-interpreted. And fourthly, the notion of ideology is expressed in a new way.

(11) **Diversity of the World** *Chen Shunwu* °144°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meets with extremely serious challenge in a tim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ed by developed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the single path of development defined by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values, and the unilater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hegemony of super powers. We must protect and promote diversity in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explore possibilities of co-existence and prosperity of cultures to ensure mankind's exist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is an issue urgently requiring a response from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is paper draws from modern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philosophical studies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of diversity and uniformity, regularity and development (progress).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directly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A world of diversity require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man's position in the society, that of nation state in the world and that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nature. Development should be obtained without scarifying diversity. To achieve this, we must build up a just and reasonable new ord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y, so that man and nature may develop in harmony and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may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rehensive progress of society.

(12) "**Japanese Experience" and the Engender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 Yi* °157°

In the early stag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Japan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activating Chinese writers' feelings toward existence and introducing foreign cultures. But this is not so simple as to say that the "experience" with Japanese literature brought new elements to Chinese literature, as is claimed in most comparative studies. We should further explore Chinese writers' life experience in Japan and try to find out the important links between the changes of these writers' feelings toward existence and thos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perhaps more proper to say that Chinese writers activated themselves as producers of literary works through their experience in Japan. They made a new reflection upon and got unprecedented understandings of their own world, which effectively brough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form.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